

遗产的现形与现行的遗产

彭兆荣 葛荣玲

摘要:遗产研究在学术界已经蔚然成风,然而,遗产概念如何起源,如何走上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如何成为工业遗产、旅游遗产等还有待梳理。本文通过对其历史背景及人文语境的分析,通过对现行遗产所呈现的复杂性、多义性、矛盾性和悖论性的辨析,试图厘清当今遗产研究的演变线索,以更好的理解当今遗产的学理与实践。

关键词:遗产 私义/公义的遗产 遗产工业 遗产旅游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9)06-174-07

一、遗产的概念谱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文塞(David Lowenthal)就指出,“保护运动的蒸蒸日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社会现象之一。它使得人们达成了一个共同愿望——记录与保存他们的遗产。这已深刻的影响到我们周围世界的形构和内容。”^[1]由于“遗产”已经反映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从概念到命题,从理论到实践,从政府到民间,从立法到行政等,致使政府和学术界对遗产所涉及的诸种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一般认为,遗产概念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私到公”的过程。遗产(heritage)一词走上社会大舞台实际上是很晚近的事情。学者们一致认为,应用过去的知识和物质遗留来构建个体及群体的认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准则之一^[2]。但是,作为特定“话语”(discourse)的遗产,是自19世纪末在欧洲首先出现,21世纪才变成了“普世化”(universalizing)话语。^[3]遗产的本义,最初是指“个人对于已故祖先的继承”,而现在的遗产概念则是其本义的“集体化”。^[4]遗产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对过去“从认知到建构”的转变。遗产原先的私有性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私义的遗产”,到后来衍生的公共化意义,不妨称为“公义的遗产”——显现出明显的建构色彩。正如《过去多元化》的序言中所说:遗产是根据现在需求而创造、建构的,为现时需求服务。^[5]遗产的这一建构性特征,强烈体现在遗产的多义性和实践性上。

自19世纪以来,遗产概念及理念最先在欧洲获得普遍认同并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保护准则。之后,遗产保护的观念和法则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可,尤其是在美国和印度等地的传播,是与英国的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在19世纪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而遗产,比如历史遗址作为塑造民族的文化形象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符号资源,因而备受关注。对于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在19世纪开始的浪漫主义运动及其宣扬的“原始野性”(pristine wildness)观念,对后来的自然遗产保护观念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社会与政治精英在进行的民族遗产的文化立法和管制也对遗产概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6]换言之,遗产从“私义”到“公义”的演化轨迹也反映了历史的变迁。1952年,在战后美国编纂的《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中,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伊文斯(Luther H. Evans)开宗明义:“我们的文化遗产,表达于公众日常生活之中,而这公众日常生活,便是我们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品质的集合和主旨。”^[7]明确表达了将遗产概念打通个人性(private)与公共性(public)之间限制的思想。

拜辛(Claude-Marie Bazin)通过考察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工业遗产的发展线索,对遗产概念由私而公的变化进行梳理。他认为,要考察遗产概念的转变,可以从词源学的角度入手,对于三个表示遗产概念的词,heritage,patrimony和succession进行细致的分辨。^[8]根据对法国私法(droit

作者简介:彭兆荣,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05;
葛荣玲,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访问学者,福建厦门,361005。

privé的考察,拜辛发现,同样表示遗产或继承权的三个词汇,分别有着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区分。甚至直到最近,包括法国、英国、美国等在内的很多国家法律中也都没有出现过“国家遗产”(或民族遗产,national heritage)的官方说法,heritage这个词条在相关的关于保护国家遗址及其他历史遗迹的法案中都没有出现。直到1975年,法国的公法(droit public)中才借用私法中的heritage这一词条,用“特定遗产”来指称原先的国家遗址等公有遗产概念。公法中的heritage一词,将原先私法中的heritage、patrimony、succession三个词条进行了模糊处理,而正是公法中的heritage的模糊性,使得遗产概念在由私到公的转变中产生了意义上的多重特征。

在“私义的遗产”意义上,succession一词,表达的是一种现在的、静止的观念,指继承人在法定的那一刻所继承到的那个遗产及其处置权;Heritage一词,强调的是一种过去的概念,在谱系上表达的是父子关系,其本义侧重于“从父辈继承而来”的遗物;而patrimony一词,则指向的是儿子及将来,这里的遗产概念不是静止的,而是表达遗产从父辈向子辈、及将来继承人的传递。因此,patrimony一词更加具有实践意义,其持有人不仅已经获得了所有权,继承到了父辈的遗产,并且持有人自身也可能已经成为父辈,对于遗产的将来有很高的处置权。将这个遗产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遗产概念,就为遗产从其原义中分离出文化遗产的意义提供了逻辑前提。当“公义的遗产”将原先的三重意义模糊化统合之后,遗产概念开始更多的指示“现在”和“发明”的意义,其所本来应该指示的“过去”意义,则成为各种附加值的依附体,成为被异化的“他者”客体。^[9]

现代遗产已经变成一个多义词。特布里基和阿斯华兹(Tunbridge & Ashworth)总结了遗产在社会公共理解层面上的五种意义:^[10]

1. 遗产作为过去留下来的一切物质(physical)遗存。这一内涵说明了遗产的物体实在意义,主要包括博物馆的收藏、考古遗址和被指定的纪念性建筑等,还包括那些已经没有任何实体性历史遗存;即那些与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相关联,也被作为遗产来对待。由于其地域界限上的不确定性,可能整个区域都可被当成为“遗产地”。从这个意义来看,不仅故宫博物馆里收藏的物品、马王堆出土的汉墓、曲阜的孔府府第是遗产,已经见不到历史踪影的赤壁古战场遗址也是遗产。

2. 对于物体、建筑、遗址、地点等遗产,附丽的能够表示“过去”意义的非物质性(non-physical)遗留,也属于遗产。从这个层面来说,不仅“集体记忆”算作遗产,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造成的现状也可被称为遗产。例如,现代美国黑人不如人意的教育成绩、住房状况等,可被称为“奴隶制的遗产”;中

国人的一些思想道德观念、行为方式及礼仪,也可被称为儒家伦理的遗产。遗产的真正所指往往不是遗产物自身,而是在其身上所体现和传递的“记忆与知识”,及其所具有的“应用、重塑和再创造那些记忆与知识”的能力。这不仅使人们能够理解我们是谁,并且更重要的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想成为谁。^[11]

3. 遗产除了指称过去遗留的物体或器物,还指一切由于历史累积而形成的文化和艺术的生产力及其产品,既包括过去制作的也包括现在生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遗产便是社会文化活动,包括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遗产的人类创造能力的肯定和提倡,致使遗产观念迅速渗透到民族或族群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将遗产、文化、艺术、娱乐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的比比皆是。与此同时,在族群层面上,尤其是对于原住性(indigenous)族群而言,包括口头文学、手工制作、歌舞表演、仪式活动及文化空间等在内的族群遗产,具有“世俗”中的“神圣性”,起到族群认同的作用。因此,一味将其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商业化开发,不仅使游客对其真实性(authenticity)产生怀疑,可能也对族群认同和情感产生消极影响。

4. 遗产概念不仅包括人类的社会历史性产物,还可以推而广之到自然环境,包括“遗产地景”(heritage landscapes),甚至还包括“动植物种群遗产”(heritage flora and fauna),即古代遗留的物种或是被认为具有原始或典型的物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2年又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使自然遗产的观念在社会各层面得到广泛的认可。对于此类遗产的提倡和保护,美国是先行者,早在1872年美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其中不仅有丰富的景观遗产,包括涵盖全球一半种类的地热类型,和近三分之二的集中性间歇泉,还生长着十分多样的野生种植物种群,成为自然遗产保护的典范。

5. 遗产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尤其是当代的“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12]将遗产元素开发为商品或是服务,也构成了遗产的内涵之一。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遗产休闲和旅游体验。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是一种“自觉的”将自己的休闲活动“与记忆中的或是认定的过去联系起来”的行为,^[13]其中包括怀旧、记忆、真实性等的诉求和争论。^[14]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对于时间上的认知需求被转化为对地缘和空间上的“异域性”、“过去时”追求。^[15]这种追求的结果往往是将异域异质的族群重新划分到“过去”、“落后”、“原始”的时间之轴上,是对种族、进化观点的重拾和隐喻,值得学者们重视和思考。这一点既体现在西方社会对于非西方的期待上,也体现于本土主体族群对于边缘族群的重新分类中。^[16]

二、遗产的语境与衍义

虽然遗产的概念和知识体系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漫长而特定的历史,但是从上个世纪开始普及的遗产话语,却基本上是由西方倡导的,遗产话语甚而“遗产运动”。^[17]与其他 20 世纪开始流行的话语一样,是伴随现代主义等西方观念,并以全球化进程为其舞台而被广泛接受;使现代遗产变得复杂和暧昧,充满悖论和吊诡。其中几个历史遗产主题尤其如是。

1. 战争与遗产保护

战争与遗产有着不解之缘。^[18]它既破坏遗产又制造遗产,既毁灭遗产又生产遗产。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所看到的“伟大遗产”都与战争有关。巴黎的凯旋门就是一个典型。战争对于遗产的破坏,或以“破除迷信”的名义,或把文化遗产作为“战利品”,历史性地与战争与遗产捆绑在一起。公元 391 年,罗马皇帝西奥多西一世便下令毁掉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塞拉匹斯神庙,^[19]除掉非基督徒的最后避难所。在人类历史上,关于战争中对于“战利品”的处置,成为第一个遗产命运的争论焦点。罗马时代的战争,便有着争夺、毁坏、买卖、赠与文化作品的传统。甚至以“嫁妆”(dowry)或“继承”(inheritance)的方式,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带回战败地的文化作品以增加本国荣耀的做法再一次成为时代潮流,到了拿破仑战争时代,这种做法更是贯彻到现代法国的思想之中。^[20]

战争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使人们,尤其是战争参与者,不得不思考并制定相关措施,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19 世纪后半叶,关于保护战败国文化财产的思想逐渐成为被接受的道德原则。1863 年,林肯总统发表了《利伯法典》(Lieber Code),即所谓的《美国军队战场指南》(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明文规定经典艺术作品不可毁坏。1899 年的《海牙公约》,开始从国际范围阐述战争中保护文化遗产的思想。1907 年,著名的《第四项海牙公约》中提出,战争中必须杜绝损害“一切致力于宗教、慈善及教育的组织机构,历史遗迹(historical monuments)和艺术作品。”^[21]之后,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历史古迹保护保存机构都被纳入了被保护之列。2006 年,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对下令攻击世界遗产杜布罗夫尼克古城进行攻击的前南斯拉夫军队指挥官处以囚刑,就是一个例子。^[22]战争中遗产保护法令的制定,也孕育、提供了和平时期的遗产保护的思想和法则。几乎所有战争都不可避免的造成遗产的劫难。^[23]而对战争与遗产的讨论也有助于对战争性质的深刻反省。

2. 遗产与殖民主义及民族主义

殖民主义加强了文化遗产的流动性,同时也塑造了形

色色的殖民主义遗产。与此同时,遗产运动的兴起也为殖民地人民的族群认同和独立运动创造了契机。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遗产与世界体系的认知以及对第三世界遗产的反思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

遗产话语最初是与 19 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观念及运动联系在一起的。^[24]这两种理念导致了人们对于“过去物质”的关注,这可以在英、法、德等国的大量文献中找到佐证。启蒙理性使整个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接受了“客观真理”、“自然知识”这样的理念,而进化论则为当时的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思想支撑。工业化的进程及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加强了人们的“历史意识”,^[25]与之相伴随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方面强化了基于“血缘与地域”(blood and land)的民族认同观念,^[26]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在物质过去中寻求认同资源。

事实上,殖民地遗产走上世界舞台,最初有很多是通过殖民者的展览活动及东方学研究的兴起而实现的。米切尔的《殖民埃及》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成为分析殖民者如何制造和实行殖民地遗产的历史实践的里程碑式著作。在 19 世纪后半叶,埃及殖民地的遗产开始在英国博物馆中的世界展览厅堂里出现,与之伴随的是西方学术对“东方学”兴趣的升温。^[27]而这两种实践,一起构建了当时所谓的“世界图景”(world picture),并且以历史进化论的观念将殖民地的生活图像纳入人类早期历史的形态。充分表达了殖民地宗主国的文化心理。殖民者将这种展览解释为他们自身历史的展示,更使得这种实践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殖民渗透,在象征层面展示了所谓的“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以彰显他们的文化自信。^[28]

在这个过程中,殖民者毫不犹豫的挑起了展示者的重任,将殖民地的遗产转移到殖民所属国进行展览。比如 1851 年开放的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的历史,就被认为引导了一种“国际博览”(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的新时代。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各个大城市都争先恐后建设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s),不仅展示了西方国家的文明,宗主国也通过这些博览会来巩固和确信他们的殖民帝国雄风。可以说,世界博览会成为了殖民帝国的“想像共同体”和“发明传统”的一面幻镜。^[29]

同时,殖民者在殖民地培养了大批本土精英,辅以教育的力量,使这种理念成为殖民地社会接受的信条,甚至在殖民地解放后很长时间内,他们的遗产形态及分类展示仍旧是殖民时代的模式。在伊萨波里亚(Niloufer Ichaporia)的博士论文《为外国而疯狂》中,作者发现,印度存在约占人口 5%的“被异化的西方化精英”(alienated westernized elite)。^[30]从 19 世纪开始,印度的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将自己的子女送往英

国接受精英教育;印度独立后,这些人仍对印度的传统艺术、美学取向及时尚潮流产生主导性的影响,以至于印度的艺术市场和文化遗产观念都不可避免的被“西方”,尤其是其前宗主国英国的文化及品味所左右。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盛行,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强化以自己丰富的遗产及其承载的历史记忆为纽带,并将他们的遗产作为殖民地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资源。这一切都表现出遗产的多义性。

3. 遗产与恐怖主义

如果说战争的性质还有所谓“正义/非正义”之分的话,世界人民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则是共识性的。它对人类遗产的存亡造成了不可预期、不可控制的巨大威胁。

1992年,印度的极端主义者毁掉了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osque)。^[31]2003年8月,印度孟买发生多起恐怖主义爆炸事件,^[32]其中一起爆炸发生在孟买的城市标志、著名的“印度之门”(Gateway of India)附近。一些印度教徒认为这个清真寺建立的地点几百年前是一座纪念印度教地位最高的拉玛神诞生的寺庙。以官方的文献记载可知,“印度门”是以英国殖民者从1911年到1924年在当地建造的一所标志性建筑,以纪念英王乔治五世1911年访问孟买而修建。

恐怖主义对遗产的破坏,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组织的“毁佛运动”最为极端;其口号是建立世界上最纯洁的伊斯兰教国家。2001年2月27日,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以反对偶像崇拜为由,下令摧毁阿富汗境内的所有佛像,其中包括位于巴米扬省的两座著名的巨型石雕佛像。^[33]塔利班宣布摧毁佛像的决定令世界震惊,国际社会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而加紧进行外交努力。尽管国际社会强烈抗议阿富汗塔利班的“毁佛”行动,但从2001年3月1日开始,塔利班还是动用了坦克和迫击炮等重型武器,把两座古老巨佛炸毁。这一事件导致在2003年7月巴黎召开的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尽管阿富汗并没有申报,但巴米扬山谷(Cultural Landscape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Bamiyan Valley)还是被列入当年世界遗产名录,并且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巴米扬山谷是2001年震惊世界的塔利班炸毁两尊巴米扬大佛悲剧的见证,选中巴米扬山谷进入名录,“象征着国际社会希望类似蓄意摧毁佛像的极端行为不会再次发生”。^[34]而如此肆无忌惮地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又从另一种意义上,即对恐怖主义做出超越政治层面的认定。

像塔利班这种“文化恐怖主义”行为,^[35]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国际法案在国家和地区效力到底能有多少。尽管《海牙公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布的一系列公约都强调缔约国具有保护国内遗产的责任,但是即便是对缔约国,例如阿富汗,在其境内发生的

恶意自毁文化遗产事件,国家法案与条约似乎都显得无能为力。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世界大会在巴黎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主要便是针对巴米扬事件所进行的应对措施。《宣言》重申了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54年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及其1954年和1999年的两项议定书,以及1949年的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第一和第二项《附加议定书》等所倡导的保护文化遗产的精神,制定和重申相关国际法以及刑事制裁权等条款和形式,以确保文化遗产在和平或武装冲突时期均得到有效保护。^[36]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遗产保护逐渐被提升到“人道”的高度。

三、现代遗产与旅游时代

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逐渐进入了大众旅游消费时代。正如遗产的传递是与人类代际继承一样古老,旅游行为也是与人类迁徙历史一样久远。但是所谓的“大众旅游”(mass tourism),却不过只有短短半个世纪的历史。旅游已经从传统的“中产阶级”、“休闲阶层”的专属性活动转变成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旅游更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时尚,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37]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指令:每一个人必须到其它一个什么地方,不去旅游成为“过时的”生活方式。^[38]

为什么人们在时下对遗产的命运给予特别的关注呢?原因之一是群众旅游的到来,使遗产与遗产地的承受力和承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使遗产的归属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曰“隐形变更”——遗产的原初性归属因出于某种需要而事实上将遗产的主导权转移甚至“出让”,使遗产的归属权和主体性出现“倒置现象”——为了外来者的利益而改变遗产的自我传承方向和轨迹。遗产主体性的“倒置”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1. 游客成为遗产和遗产地事实上的“主人”。由于旅游会给遗产地带来经济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这一目标,许多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商业团体会在原生的遗产和遗址上人为性地“动手术”、“整容”。2. 游客通过到现场“观光”人类遗产来确认和反省自己。比如游客通过参观博物馆在历时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建立人类的认知框架。遗产在不同的游客那里获得了理解、阐释、认识方面最大化的时代价值。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群众旅游的出现其实只是现代社会属性的表象,那么,现代社会属性是什么呢?一种具有共识性的认知和表述是:“移动性”是后现代社会最具表现力的社会方式和社会属性。具体表现在:以往传统社会里发生并限制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范围的事情和事务已经发生变化,成了超越社会、民族和地域边界的全球性事情和事务。然而,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形成了挑战。而那些不同类型的遗产也在这一社会属性的作用下出现了“想象”的扩大、移位和“形象”的多样、变化。后现代主义的“移动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旅游文化”，并成为拥有广泛使用空间和争论的议题。^[39]对遗产的“消费”也成了大众旅游的一种时尚，表现为：1. 大众市场的时尚变化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不仅表现在像服装、装饰、装潢等方面的变化情况，也包含了与生活方式和生活“再创造”理念相联系的更多方面，诸如休闲、旅游等。2. 现代社会的再生产提高了遗产的可“消费性”。^[40]有的学者据此称之为“后现代主义遗产”(post-modernist heritage)。^[41]在这样的背景下，“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必然出现。诚如学者所说：“遗产叙事是一种为了旅游目的而被选择的特殊表述方式。”^[42]在现代语境中，遗产成为旅游中的一个品种、品牌进入到大众消费领域。

在现代旅游的浪潮冲击下，除了对遗产的消费呈现出新的关系外，还有一种认知和观念性的变化，这就是空间的扩大化，即与都市化进程相一致，把消费范围和对象扩大到“到处的社区”(everywhere community)，^[43]出现了一种对商品化对象情感丧失的“物化”现象。对于一个旅游者来说，当他以消费形式面对遗产，或到某一个遗址的时候，人们只能期待那一个游客拥有足够的旅游道德水平和公德素质去“消费”遗产。然而，毕竟某一个具体的遗产对游客并没有传承上的情感和忠诚的必要性，他充其量只是一位匆匆过客；人们当然希望在公德层面上不给遗产地造成任何污染和破坏。然而，这种一厢情愿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重要原因在于，那些遗产不属于他。

“遗产旅游”包括了对遗产价值的区隔和分裂因素：1. 游客与东道主对遗产的认知和实践价值存在着差异。对游客而言，到遗产地旅游只是“客位性”的，而东道主则属于“主位性”的。2. 对于游客来说，到某一个遗产地旅游属于“观光”活动，而对于家园遗产的地方民众来说，遗产成为他们的“展示”活动。3. 由于遗产的所属权发生了转换，遗产地政府为了配合旅游，迎合游客的“时尚口味”而对遗产进行改造、装饰等，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创造遗产”的行为。对此，家园遗产的主人经常处于“失语”状态。4. 现代旅游是以资本作为交换的活动。当资本的“中介”性质被凸显出来并成为现代社会的杠杆时，遗产便很可能面临一场劫难。

现代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使传统意义上的遗产“生产”出新的分享、欣赏、承载、利用、污染等的消费人群。反过来，遗产成了一种吸引、招揽游客的无可替代的资源 and 品牌，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和团体，以及地方民众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也会对遗产进行改造、装饰、遮蔽等；这些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遗产本身产生了变化，也使游客所看到、接触到、感受到的遗产已经“失真”。因此，在旅游人类学的研

究领域里，“真实性”遂成少数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比如，“谁的遗产”在往昔的形态上和形式上相对比较简单，人们也容易辨识遗产的所有者和所属者。因为涉及其中的关系相对较少。今天，随着大量游客的到来，同一问题的范围就扩大了，出现了明显的“东道主/游客”之分，遗产已经成为观光客、朝圣者、社区共同体全体成员、原属于某家族传承的成员，以及学术研究和政府部门等的“共有财产”。这些不同因素和关系的迅速进入，打破了遗产原来的关系格局，解构了遗产的原生结构，改变了遗产的原始形貌。遗产的“真实性”与遗产的“创新性”之间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如下所示：

遗产真实性 相关因素	描述	建构遗产诸因素的例证
创造者	遗产的原始	被证明所取得的特殊性
物质	原始物质	构成的原始物质，比如石头等
功能	原始目的	满足功能的使用，如教堂
概念	创造者的理念	指取得的意愿，包括恢复的意愿等
历史	手工艺的历史	特定的时代以及其变迁和维护
整体	遗产的整体性	整体地看待，如建筑物、花园等
情境	处地的整合性	建筑与原址与环境关系的原始关系
经历	原始的情感	遗产的所用者仍然存在着原始情感
风格	“看着独特”	与原始外在形态相吻合的制作

这些因素的注入和存在不仅对遗产、遗址等的设计、规划和保护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作用，需要格外小心和注意，同时也涉及到了遗产真实性构成和对该问题的讨论。^[44]也因为现在的遗产运动中出现了许多附加性、人为性的因素，致使我们所讨论的遗产与原生性遗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而现代的遗产批评也将此当作致命的攻击点，即：传统遗产与制造遗产之间的“真实性”问题。^[45]质言之，由于大规模旅游以及后现代社会的属性变化，使遗产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一场空前的“转基因”革命中，遗产已经成为“现代的遗产”，它与“真正的遗产”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遗产概念纳入了世界视野，旅游则重新将遗产实践置于地方舞台。拜辛认为，目前流行的遗产化(patrimonialization)策略，^[46]正为资源的旅游化开辟了通道。人们将越来越多的事物归类于“遗产”系列，使之获得更多的附加值，民族国家遗产被顺理成章的置入跨国旅游开发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为家们采取了一系列策

略:制度、分类与定型,并且制定出两条相互交织的信条(doctrine),一方面教育学家将文化/遗产转变为社会智识增长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则将文化旅游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47]这两种信条共同烘托出一个遗产旅游的宏观图景,也为世界与地方的遗产概念及旅游实践互动提供了社会认知基础。

四、结语

纵观遗产概念的发展历史,人文背景,和遗产的多重意义等已经形成“话语”。当下的问题是,人们甚至还没有试图去厘清遗产概念的相关问题,遗产运动便已匆匆开展起来。这种经济开发、政治策略、认同建构上的多重操作,已经使人们深刻体会到了遗产急于开发造成的种种文化、生态、社会弊端。希望人们在大规模遗产运动的背后,能够更多的反思,知其源流,通其脉络,正其方向,不仅使遗产能够为我所用,也使整个社会能够为遗产的命运恪尽职责。

注释:

- [1]Lowenthal, David & Marcus Binney, *Our Past Before Us: Why Do We Save It?*. London: Temple Smith, 1981. p.9.
- [2]Harvey, D. C.,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1, 7(4): 319-338.
- [3]Smith, Laurajane.,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7.
- [4]Tunbridge, J. E. &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New York; Brisbane; Toronto; Singapore: J. Wiley, 1996. p.1.
- [5]Ashworth, G. J.; Brian Graham & J. E. Tunbridge, *Pluralising Pasts: Heritage, Identity and Pla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London;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 [6]Smith, Laurajane.,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17-23.
- [7]Burr, Nelson R. (compiled.), *Safeguard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 A Bibliography on the Protection of Museums, Works of Art, Monument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Time of War*. Washingto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General Reference and Bibliography division Reference department, 1952. p.v. Foreword.
- [8]Bazin, Claude - Marie.,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 Translated by Kunang Helmi. In Lanfant, Marie - Françoise; John B. Allcock & Edward M. Bruner (eds.) *International Tourism: Identity and Change*.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p. 120-124.
- [9]Guillaume, M., *Patrimones en folie*. Paris: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0, p. 16. See Bazin, Claude - Marie.,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 Translated by Kunang Helmi. In Lanfant, Marie - Françoise; John B. Allcock & Edward M. Bruner (eds.) *International Tourism: Identity and Change*.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 122.
- [10]Tunbridge, J. E. &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New York; Brisbane; Toronto; Singapore: J. Wiley, 1996. Pp.1-3.
- [11]Smith, Laurajane.,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2.
- [12]Tunbridge, J. E. &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New York; Brisbane; Toronto; Singapore: J. Wiley, 1996. p.2;
- [13]Tunbridge, J. E. &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New York; Brisbane; Toronto; Singapore: J. Wiley, 1996. p.2.
- [14]Nelson H. H. Graburn, *Tourism, Modernity & Nostalgia*. In A. Ahmed and C. Shore (eds.) *The Relevance of anthrop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95, pp. 158-177.
- [15]Lawenthal, D.,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6]格雷本教授对于“第四世界艺术”的定义,便是对这种旅游行为的很好的诠释。见 Graburn, N., "Introduction: The Arts of the Fourth World". In N. Graburn (ed.), *Ethnic and Tourist Arts: Cultural Expressions from the Fourth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1-32.
- [17]彭兆荣:“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 [18]Kate Fitz Gibbon, "Chronology of Cultural Property Legislation". In Gibbon, K. F. (ed.) *Who Owns the Past?: Cultural Policy,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Law*.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7.
- [19]塞拉匹斯(Serapis,也写作 Sarapis):古埃及地下之神,其崇拜者曾遍及希腊、罗马。由第一个统治埃及的托勒密一世(Ptolemy I)在埃及古城孟斐斯创立,综合了奥西里斯(Osiris,阴间神)与阿匹斯(Apis,圣牛神)崇拜,以共同信仰来调和与统治埃及人和希腊人。
- [20]Dorothy Mackay Quynn, "Art Confiscation of the

Napoleonic Wars".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pril 1945, pp. 437 - 460.

[21]"Hague Convention No. IV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In Filbert, Brent G. and Alan G. Kaufman (eds.). *Naval Law: Justice and Procedure in the Sea Servic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8. P. 348.

[22]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 Old City of Dubrovnik, <http://whc.unesco.org/en/list/95>.

[23]Boylan, P., Review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UNESCO, Paris, 1993.

[24]Smith, Laurajane.,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7.

[25]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1.

[26]Olsen, B. "Excavating the Other: European Archaeology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 K. Kobylinski (ed.) *Quo Vadis Archaeologia: Whither European Archae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Warsaw: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2001. p. 53.

[27]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28]Mitchell, Timothy.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6 - 7.

[29] Kirshenblatt - Gimblett, Barbara., *Destination Cultures: Tourism, Museum, and Heritag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79.

[30]Ichaporia, Niloufer., *Crazy for Foreign: The Exchange of Goods and Values on the International Ethnic Arts Market*. Thesis (Ph. D. in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June 1980, p. 223.

[31]Saikal A. and R. Thakur, "Vandalism in Afghanistan and No One to Stop it," in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6, 2001. <http://www.unu.edu/hq/ginfo/media/Thakur38.html>.

[32]<http://news.21cn.com/world/guojisaomiao/2003/08/25/1243098.shtml>

[33]位于阿富汗中部喀布尔西北的巴米扬,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印度、伊朗和中亚的交通要道,因而,巴米扬也成为了当时佛教化艺术的中心之一。其中著名的巴米扬石窟,大约建造于公元 3 至 5 世纪间,巴米扬石窟拥有两项世界之最:它是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巴米扬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古代佛像。

[34]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 Cultural Landscape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Bamiyan Valley. <http://whc.unesco.org/en/list/208>.

[35]Hammond N., "Cultural Terrorism,"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5, 2001.

[36]"UNESCO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UNESCO,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32nd Session Paris, 29 September to 17 October 2003. Pp. 62 - 64.

[37]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第 4 页。

[38]MacCannell, Dean.,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1976).

[39]Mowforth, M. & Munt, I.: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and New Tourism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5.

[40]Graburn, N. H.: *Learning to Consume: What is Heritage and When is it Tradition?* In N. ALSayyad (ed.): *Consuming tradition, Manufacturing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68.

[41]Uzzell, D. L. (ed.):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Introduction: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1989. p. 3.

[42]Boniface, P. & Fowler, P. J.: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the global vill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10 - 11.

[43]Boorstin, D. J.: *The Americans: The Democratic Commun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44]Howard, P.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p. 227.

[45]Lowenthal, D.: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8.

[46]关于此处为什么用 patrimonialization 而不是 heritagization,请参考前面“遗产的来历”一节中 Bazin 对于 heritage 和 patrimony 的辨析。

[47]Bazin, Claude - Marie.,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 Translated by Kunang Helmi. In Lanfant, Marie - Françoise; John B. Allcock & Edward M. Bruner (eds.) *International Tourism: Identity and Change*.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p. 116 - 117.

责任编辑:禹兰